

文学及语言

论晚明时事政治小说的纪实性 及其形成原因*

刘鹤岩

【提要】进入晚明以后,明代通俗小说的创作逐渐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小说越来越靠近现实,二是小说中有关时政题材的作品越来越多。晚明时事政治小说的兴盛是中国小说史上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晚明时事政治小说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就是注重纪实。晚明时事政治小说纪实性形成的内在原因主要有:中国小说的史传传统;明代私人修史的风气;晚明时事政治小说均为当代题材;邸报、奏疏诏议的大量使用。

【关键词】晚明 时事政治小说 小说纪实性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952 (2015) 01—0105—05

明朝中后期,中国通俗小说进入了一个空前繁荣的阶段。作品竞相媲美,作家各擅其长,作品题材广泛多样,风格流派纷呈,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神魔小说、人情小说诸多作品陆续登场。万历中后期,进入晚明以后,通俗小说的创作逐渐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小说越来越靠近现实,二是小说中有关时政题材的作品越来越多。晚明时事政治小说的兴盛是中国小说史上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自从万历三十一年(公元1603年)《征播奏捷传》出版以来,在晚明时期,以明朝本朝政治题材为内容的通俗小说作品就不断涌现,出现了一个时事政治小说的创作高潮。比如叙述阉党专权的《警世阴阳梦》、《魏忠贤小说斥奸书》、《皇明中兴圣烈传》、《梏杌闲评》、《樵史演义》,描写辽东战事的《辽海丹忠录》、《镇海春秋》、《平虏传》,还有用作政治斗争工具的《辽东传》、《大英雄传》、《放郑小史》等等。

过去许多学者把晚明时事政治小说作为历史小说来研究,在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中,《梏杌闲评》是放到第十五篇元明讲史中来论述的。在孙楷第的《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中,《承运传》、《皇明中兴圣烈传》、《辽海丹忠录》也是放到卷三明清部二讲史类中,丁锡根的《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中,把《续英烈传》、《于少保萃忠全传》、《警世阴阳梦》、《魏忠贤小说斥奸书》、《皇明中兴圣烈传》、《辽海丹忠录》、《近报丛谭平虏传》、《樵史通俗演义》排在了第三编章回讲史类里面。上个世纪80、90年代以来,为了对这些小说做进一步深入细致的研究,以得出正确的评价,学术界把这些写当

* **【基金项目】**本文为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辽西地域文化与明清时事小说》(项目批准号:L13DZW015)阶段性研究成果。

代社会政治生活的小说命名为时事小说，以区别于那些演绎前代历史的历史小说。齐裕焜、陈大康、欧阳健、周维培、刘书成等诸位先生在其专著和文章当中，对时事小说概念及其思想内容、艺术特色进行了较为详尽地分析，齐裕焜界定了时事小说的概念，他以作者与作品所写事件的年代距离一般不超过一代人（即三十年左右）为限，认为满足这个条件的“及时迅速地反映当代重大事件、大量记叙了当时的文献资料和传闻轶事，反映了同代人对事件的认识和情感”的小说是时事小说。^①

刘书成提出了新的划分界限：“其作者是所叙事件的同代人，换言之，作者与作品所写事件的年代距离一般不超过二十年左右”。^②

陈大康的文章则认为时事小说所写的事件与作品问世时间的最大时间差应以十年为限度。^③ 欧阳健主要强调时事小说诞生在史籍之前的特点。^④ 周维培从时事小说的主题入手，着重分析了时事小说的史料价值和文学成就。^⑤ 上引刘书成的文章则分析了时事小说的特征和产生的原因。在时事小说的主要内容是反映当代重大事件这一点上，诸家有了共识，但是在时事小说时间的界定上，诸家还有一定的分歧，也就是小说距离本事的时间间隔，到底是多长时间，可以作为划分时事小说和历史小说的界限，目前还没有统一的标准。除了上述论文之外，还有一些学者在其专著中单立章节对时事小说加以论述，如陈大康的《明代小说史》、齐裕焜的《中国历史小说通史》、欧阳健的《历史小说史》等等，论述的主要内容和观点与其发表的论文的内容和观点大致相同。

我们认为与其把这些小说叫做时事小说，不如叫做时事政治小说更加贴切。因为这些小说不仅反映了当时的时事，而且都与政治有关。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晚明时事政治小说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就是非常注重纪实。

在这些晚明时事政治小说中，许多作者在文中，一再强调自己的作品是实录。《续英烈传》的作者在《续英烈传·叙》中写道：“胸贯三长，而后可以定一朝之实录；识破千古，而后可以论一代之是非”，称本书“然词取达意，

固不敢自附于野史之例；而事必摭实，或亦免于续貂之诮欤？”《魏忠贤斥奸书》的作者在其《斥奸书凡例》中自述说“是书纪自忠贤生长之时，而终于忠贤结案之日，其间纪各有序，事各有伦，宜详者详，宜略者略，盖将以信一代之耳目，非以炫一时之听闻。”“是书自春徂秋，历三时而始成。阅过邸报，自万历四十八年至崇祯元年，不下丈许，且朝野之史如正续《清朝》、《圣政》两集，《太平洪业》、《三朝要典》、《钦颁爰书》、《玉镜新谈》凡数十种，一本之见闻，非敢妄意点缀，以坠于绮语之戒。”“是书动关政务，半系章疏，故不学《水浒》之组织世态，不效《西游记》之布置幻景，不习《金瓶梅》之闺情，不祖‘三国诸志’之机诈。”《辽海丹忠录》的写作标准是“至其词之宁雅而不俚，事之宁核而不诞，”（《辽海丹忠录序》）《樵史通俗演义》的作者自诩：“樵夫野史无曲笔，侃然何逊刘知几。”^⑥“所摘疏章，皆字字有关系者，可以补正史而垂千秋。”^⑦“此回事事笃实，高闾一段传闻甚确，特为拈出，以备正考。”^⑧“字字实录，可为正史作津筏。”^⑨《警世阴阳梦》的作者甚至还说自己与魏忠贤有个人往来，虽然这不过是书商为了追求利益，编造的噱头，但是通过这一点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对小说纪实性的推崇。

为什么在晚明时事政治小说创作中，纪实性如此突出呢？其内在原因可从以下四个方面来分析：

- ① 齐裕焜：《明末清初时事小说述评》，《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
- ② 刘书成：《明清之际时事小说的基本特征及繁荣原因》，《甘肃社会科学》1994年第3期。
- ③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
- ④ 欧阳健：《超前于史籍编纂的小说创作——明清时事小说新论》，《文学遗产》1992年第5期。
- ⑤ 周维培：《明末清初时事小说综论》，《南京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
- ⑥ 《樵史通俗演义》第1回，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
- ⑦ 《樵史通俗演义》第2回末评，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
- ⑧ 《樵史通俗演义》第27回末评，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
- ⑨ 《樵史通俗演义》第34回末评，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

一、中国小说的史传传统

中国小说虽起源于神话，但是正如石昌渝先生分析的那样，中国不像欧洲那样从神话通过史诗、传奇发展到小说，中国小说是在史传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①因此中国小说与生俱来就带有浓厚的史传特点，中国是一个史学发达的国家，漫长的发展历史和与之相伴的悠久的史传记载过程，使求真尚实的历史观念深入人心，同时也影响了其他社会科学分支，在中国古代，文学、历史、哲学几乎是三位一体式的共同演进与发展，“六经皆史也”，^②中国的古代小说作家们也深受其影响，如果说在文学中还有虚构和想象的话，那也只是在诗文创作中，“事信而不诞”^③则是评价史传和小说作品的重要标准。小说应该是“皆有所据”，“言非无根”。（《醉翁谈录》）被称之为“史补”、“史之余”的小说，始终以纪实为最高标准。无论是丛残小语的魏晋小说，还是有意创作小说的唐代传奇，这种原则一直贯穿在中国小说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特别是以历史为题材的小说更是如此，甚至干宝的《搜神记》也是为了“发明神道之不诬”，并说“一耳一目之所亲闻睹”，“无失实者”，干宝也因此得名“鬼之董狐”。^④唐代刘知几认为偏记小说可分十类，写历史事件的最忌“真伪不别，是非相乱”，^⑤另外，在小说批评中也常常以史传的标准来衡量，如“史笔”、“良史”、“列传体”，之类的评论口吻，屡见不鲜。小说作家也常以史学家自居，把写小说看成是修史，《谢小娥传》作者李公佐自言“知善不录，非春秋之义也。”他在《南柯太守传》中也宣称“事皆摭实”。李肇评价《枕中记》、《毛颖传》为：“二篇真良史才也。”（《唐国史补》）尽管到了宋元时期，出现了一批虚实相间的讲史作品，但是在创作理论和实践上仍然是纪实派占主导地位，罗烨就明确指出：“得其兴废，谨按史书，夸此功名，总依故事。”（《醉翁谈录》）到了明代这种理论更是占了上风，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可观道人“小说不可紊乱正史”的理论主张，他认为历史演义小

说的编写，应该遵从正史，“本诸左史，旁及诸书，考核甚详，搜罗极富。虽敷演不无增添，形容不无润色，而大要不敢尽违其实。”（《新列国志叙》）

二、明代私人修史的风气

明代中后期，在史学界掀起了一股私人修史的热潮，这也是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私人修史最集中的时期。明代许多价值较高的私家史学著作均诞生在这一阶段。许多文人怀着舍我其谁的使命感，记录了历史的兴亡更替，发出了自己对世事沧桑的慨叹。更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些私人史学著作中，有些著作毫不逊色于官史、正史，无论是在反映历史的全面、细致方面，还是考证的精严、深湛方面，立论的严谨、慎重方面，这时的史学是中国古代罕见的繁荣期。

在明代初期，开国皇帝朱元璋和篡位皇帝朱棣因为各自的原因，对文化控制较严，贫民出身的朱元璋深知文化对于人心的蛊惑作用，用严格的统治手段禁锢人们的思想，并大兴文字狱，铲除异己，还把四书五经作为科举的经典，用八股取士，科举制度走向了封闭和腐朽，迫使知识分子皓首穷经，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专制制度不许人们对历史发表任何见解。而通过非正常手段登上皇帝宝座的朱棣更是忌讳史家的秉笔直书，他不仅大肆销毁建文君臣的言论书籍，而且还篡改已经编定的史书，洗刷掩盖自己的罪名。到了宣宗以后，明朝的文化专制政策有了松弛，特别是正德以后，皇帝的怠政和朝廷内部的党争，统治阶级对文化的控制陷入了一种无序的状态，这给私人修史提供了较大的空间。虽说张居正主政之时曾试图重振朝纲，但对业已失控的局面也难以整肃，正德、嘉靖以后，文学上前后七子提

① 石昌渝：《中国小说源流论》，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页。

② 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易教上》。

③ 《文心雕龙·宗经·史传》。

④ 《晋书·干宝传》。

⑤ 刘知几：《史通》。

倡尊崇汉唐的复古思潮，史学上也出现了回归《史记》、《汉书》的复古倾向。许多史家摒弃了唐宋以来官方修史的弊端，力主独立修史，成一家之言，“追纵班、马，为千载之一快也。”^①嘉靖时期郑晓、陆燾、陈建、高岱等著名史家，不仅理论上提倡私人修史，而且在实践中身体力行，撰写了许多史著。王世贞也大力提倡私人修史，以避免官方众人修史，风格杂乱，见解不一，前后龃龉的缺点。一时间私人修史蔚然成风。

明朝中后期私人修史有一个较为显著的特点，就是修撰当代史的繁盛，其原因是元代以前的历史，“前人之述备矣”，后代人如无新的史料，很难翻出新意，而被明代士子视作蛮夷的元代统治者，入主中原九十多年的统治历史，官修的元史就已经足以涵盖了。可以值得私人修史，大作文章的地方也不多。与此相比，明朝开国百年来的世事变迁，由于种种原因，官方的写法和评论，很难令人信服。这给了私人修史以极大的空间。史家关注当代史，写出了大量史著及笔记。如纪传体国史有《吾学编》（郑晓）、《皇明书》（邓元锡）、《昭代明良录》（童时明）、《名山藏》（何乔远）；纪事本末体国史有《鸿猷录》（高岱）；编年体国史有《皇明启运录》与《皇明通纪》（陈建）、《皇明大政记》（夏浚）、《昭代典则》（黄光升）、《大政记》（雷礼）、《肃皇外史》（范守己）、《两朝宪章录》（吴瑞登）；人物传记体的有：《嘉靖以来首辅传》（王世贞）、《表忠汇录》（张朝瑞）、《词林人物考》（王兆云）、《国朝献征录》（焦竑）、《皇明应谥名臣备考录》（林之盛）、《皇明帝后纪略》（郑汝璧）等等，史家的作风和观点很自然地影响了文学家的作风和观点。事实上，晚明政治小说的许多作家是把自己的小说当作历史来写，如《续英烈传》、《魏忠贤小说斥奸书》、《辽海丹忠录》从写作原则上就极力强调其历史色彩，《樵史通俗演义》干脆就以“樵史”命名。《魏忠贤小说斥奸书》、《皇明中兴圣烈传》、《警世阴阳梦》、《樵史通俗演义》大量收录诏书奏议，也是试图以史料来强化其历史的色彩，这样一来，晚明政治小说就出现了文学和历史合一的特点，这使有些作品的艺术性

大为降低，真正把二者结合得比较好的作品有《魏忠贤小说斥奸书》、《辽海丹忠录》、《樵史通俗演义》等等。

三、晚明时事政治小说 大都是当代题材

晚明时事政治小说大都是当代题材，这也是纪实风格形成的重要原因，因为是当代题材，纪实有了便利的条件，许多事情是作者亲身经历、曾经耳闻目睹过的，作者有纪实的自信心。另一方面，也正因为是当代时事，知情者甚多，许多当事人还在，作者无法虚构。一旦掺入过多的虚构内容，势必引起当事者的反驳和读者的质疑，会大大降低其影响力。此时读者的兴趣是关注事情的真相如何，而并非是作者的想象才能和虚构本领。因此，一般的规律是，时事政治小说离本事发生的时间越近，其真实的内容所占的比重就越大，如果稍远一些还会掺杂一些虚构在里面，比如《承运传》当中就不乏编造历史的情节，《梏机闲评》一书相距魏阉垮台时间较远，虚构成分居多，当然这只是一般的规律。有时也会出现例外，如《樵史通俗演义》尽管写的南明事情发生不久，但是因为个人感情的因素，反而对阮大铖的描写颇多夸张、不实之词。

四、邸报、奏疏诏议的大量使用

晚明时事政治小说大量使用邸报、奏疏，也是导致小说纪实性较强的一个重要原因。时事政治小说作者对于史料的收集是受到限制的，如有关皇宫内院、朝廷庙堂上的政治斗争，作者大都缺乏第一手资料，主要是依赖社会传闻和大量的政治文件如奏疏、邸报。许多作者是通过阅读邸报，掌握其中资料的。如《魏忠贤小说斥奸书》作者陆云龙就曾经说过：“偶阅邸报见杨大洪先生劾忠贤疏。”在该书《凡例》中，也明确指出：“阅过邸报，自万历四十八年至崇祯元年，不下丈许，”《皇明中兴圣烈传》

^① 陆燾：《与华修撰子潜论修史书》，黄宗羲：《明文海》卷174，中华书局1987年版。

的作者西湖野臣毫不隐晦地说此书是从“邸报中与一二旧闻演成”。《近报丛谭平虏传》的作者吟啸主人在序中说“近报者邸报”，而且在小说中，作者不时提到邸报，“余坐南都燕子矶上，阅邸报”；“因记邸报中事之关系者，与海内共欣逢见上之仁明智勇”。甚至在写作过程中亦步亦趋地传播邸报，“未知后事如何，俟事以论定，阅邸报再详”（《风传奴书缚督师》）。邸报的特点是纪实，因为作者对邸报的大量采用，邸报的纪实特色也就被带入了小说创作中，同时小说作者对邸报的大量运用，也弱化了作者创作上的虚构意识。除了邸报以外，就是奏疏、诏议政治文件的大量抄录，因为重大事件中，许多有关的奏疏、诏议是最好的材料，晚明政治小说的作者的小说中大量罗列这些材料。进一步增强了小说的纪实色彩，如《于少保萃忠全传》从第三十七传起一直到第四十传，几乎都是用奏疏、诏议组成的，偶尔有作者几句过渡性的语句穿插其间。第三十七传主要内容是于谦儿子于冕上的为父亲请功的奏疏和成化帝为于谦平反的御旨，还有弘治帝为于谦赠谥、建祠加祭的诰谕；第三十八传又是全文照录忠节坊的碑文；第三十九传是由进士卢玘请求让刘基和于谦的灵位进入功臣庙的奏疏、浙江巡抚傅孟春差人所上的请求改谥于谦为“忠愍”

的奏疏，还有礼部的答辞组成。第四十传则包括了傅孟春祭祀于谦的祭文、兵科给事朱凤翔为于谦表功的奏疏。对于这些奏疏的引用，《警世阴阳梦》、《魏忠贤小说斥奸书》、《辽海丹忠录》还能够化用，显得流畅自然，而《皇明中兴圣烈传》几乎是连篇累牍的抄录。

尽管晚明时事政治小说纪实性十分突出，但毕竟是小说，所以还存在大量虚构的细节。在虚实结合上，《魏忠贤小说斥奸书》做得较好，收放自如，主要事件基本遵从史实，细节虚构又能合乎常理，考虑到了历史逻辑性的统一。《梏杌闲评》则违背了时事政治小说的创作原则，在虚构的路上走得太远了。另外还有些小说尽管标榜纪实，但是因为作者的主观意识和当时的客观环境，并没能做到真正的纪实，如《辽海丹忠录》对党争的回避，《镇海春秋》对毛文龙的美化，还有些小说为了起到诬蔑党争对象的作用，打着纪实的旗号，蓄意捏造事实，如《承运传》、《大英雄传》、《放郑小史》等等。

本文作者：渤海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 2005 届
文学博士
责任编辑：马 光

On Documentary and Causes of Current Affairs & Political Novels in Late Ming Dynasty

Liu Heyan

Abstract: In late Ming dynasty two tendencies appeared in the novel creation. One was that the novels were approaching to the reality and the other was that more and more novels on current affairs & politics appeared. The prosperity of the political novels in late Ming dynasty is remarkable.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documentary is an outstanding feature of political novels at that time, which claims our attention. There are four underlying causes of becoming documentary to the political novels in late Ming dynasty. The first is Chinese novels' tradition of historical biography. The second is the general mood of compiling history personally. The third is that the themes of political novels in late Ming dynasty are contemporary. The fourth is that court bulletin, memorial to the throne, imperial edit and comments are widely used.

Key words: late Ming dynasty; current politic novels; documentary